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大家谈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程惠哲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文艺创作、文化工作的明确要求、殷切期许。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语重心长地强调，好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2015年，中央先后审议、发布《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专门召开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推进会，着力强调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使重视社会效益、担当社会责任成为文艺工作者和文化单位的自觉行动。

正确理解社会效益

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为准绳，正确理解什么是社会效益，是自觉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必由之路。

社会效益是相对于经济效益而言的。经济效益一般指企业利润，社会效益一般指企业及其产品、服务的积极、正面的社会影响和形象。社会效益的实质是通过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正当要求，顺应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发展方向，切实发挥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激励鼓舞等作用。文化企业社会效益的核心要素是承担社会责任、担当正确导向，赞誉社会正气、弘扬民族美德，反对精神鄙俗、拒斥精神鸦片、远离精神污染。社会效益的大小多少，当前主要取决于如下因素。

一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文艺创作的鲜明主题。”要生动反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着力书写寻梦的理想和追梦的奋斗，汇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是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认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居统领地位、起主导作用的价值理念，可以凝聚社会共识、维系精神纽带、巩固思想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文艺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具有独特作用”，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艺创作生产，实现核心价值观的全方位贯穿、深层次融入，让人们在文化熏陶中感悟认同社会主流价值。

三是促进文化传统的延续、更生、弘扬。文化传统是中国精神的命脉所在、坚实根基，是集中展现民族品质和性格、鲜明表达民族文化符号和特征的民族文化基因的活态呈现，通常包括民族语言、文字、服饰、建筑、审美情趣、生活习俗、道德伦理等。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创作人民群众喜欢的、健康向上的、具有中华文化底色的文艺作品。

四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爱国主义是文艺创作的永恒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代文艺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不管历史风云如何变幻，都要大力尊敬、颂扬、讴歌作出历史贡献的民族英雄，弘扬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坚决抵制否定中华文明、破坏民族团结、歪曲历史人物、丑化革命英雄的言行。

文艺作品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创作是中心任务，作品是立身之本。文艺作品在引领社会思潮、促进精神健康、推进理念新变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文艺创作不能简单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应通过对光明的歌颂、理想的抒发、道德的引导，让人们看到美好、希望和梦想就在前方，“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要求，推出更多体现时代文化成就、代表国家文化形象，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艺术震撼力强的大作力作，努力形成文艺创作生产的‘高峰’”。

文艺工作者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文艺工作者要牢固树立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理念，自觉担当起追求社会效益的职责和使命。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文艺家“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文艺界知名人士“不仅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卓越，而且要在思想道德修养上追求卓越”。文艺工作者只有不断增进与人民的感情，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多彩生活中汲取艺术营养、接受思想洗礼，才能创作有精神共鸣、历史价值的精品佳作；只有明确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摒弃低俗、庸俗、媚俗现象，弘扬公德良序，将个人的艺术追求与时代的历史使命结合起来，才能展现圆梦的奋斗、见证时代的进步、描绘历史的洪流，出彩讲述当代中国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还要求文艺工作者正确处理义利关系，牢记文化担当和社会责任，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

国有文化企业要率先做到社会效益第一

中央对文化改革发展中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问题始终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关系，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服从社会价值，越是深化改革、创新发展，越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引导国有文化企业自觉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社会效益指标考核权重应占50%以上”。

市场不是衡量文化产品价值优劣的惟一指标，经济利益不是优秀文艺家成长的最大动力，也不是国有文化企业的最高追求。面对商业大潮、市场冲刷，国有文化企业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正确导向、遵循科学发展，才能跳出堕落为市场奴隶的泥潭，才能防止肆意挥霍历史遗产、恶意作贱文化基因、疯狂毒化社会风气。

坚持社会效益首位的保障措施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要采取切实措施，避免文艺被市场肆意左右，避免以丧失社会效益为代价换取商业利益。

一是发挥体制优势和组织优势。“提高创作生产的组织化程度，防止把文艺创作生产完全交由市场调节的倾向”，引导文艺家准确把握党性和人民性、政治立场和创作自由的关系。

二是发挥财政资金的积极作用。用好专项资金、基金等财政资金，把握方向，突出重点，着力引导，“向弘扬中国梦、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文艺创作倾斜”。

三是发挥评奖的导向、激励作用。“加强和改进文艺评奖管理，严格评奖标准，既看作品也重人品，切实提高评奖公信力和影响力。”评奖、评审、考评的原则、细则要突出体现社会效益首位的导向，突出社会效益的内容、分值。

四是加强评论引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评论和理论“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通过文艺批评的警示、督促引导人们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充分发挥健康、积极、向上的文艺批评端正风气、纠偏除弊的作用。

五是加强文艺阵地管理。重视文艺阵地建设和管理，“切实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原则，加强对各类文艺阵地的管理，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绝不给错误文艺思潮和不良文艺作品提供传播渠道”。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核心是守护民族文化之根，关键是涵养中国精神之魂，根本是创作优秀作品，基础是打造德艺双馨的文艺队伍，目标是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通过“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为民族凝魂聚气、为时代凝心聚力。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明确要求“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相统一，绝不让文艺成为市场的奴隶”，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新成果新发展，作为文艺工作实现新跨越的强大动力，必将对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文化强国的建设推进产生全局性、战略性影响。

构建地域文学研究的深广空间

□张志忠

崔志远的新著《中国地缘文化诗学》（人民出版社2015年4月出版），是对地域文学研究的理论建设与实证研究的双重拓展。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转而用之，在文学批评中，理论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特别推重《中国地缘文化诗学》在理论建构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说起来，新时期以来的30余年，地域文学创作的实绩，可以说是最为显赫的，对其研究的成果也颇为可观。但是，就我所见所闻，大都是就事论事式的，其着眼点俱在于作家作品研究，理论的探索成就有限。《中国地缘文化诗学》可以说是构建地域文学研究理论的极为认真而且成果颇丰的一次实践。从事当代文学批评，需要灵气感悟，也需要理论支撑。灵气无法教化，强调理论背景，尚有可行之处。惜乎当下的年轻学子，被各种实用的功利性需要所左右，真正坐下来读书的时间有限，读理论书籍更是不尽人意。而《中国地缘文化诗学》则在理论素养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显示出了非常的功力，举凡人文地理学、精神分析学、城市地标理论、爱情心理学等，皆有所涉猎，取材广博。譬如说，过去一直以为山西、河北同是一片黄土地，同属于黄河流域，山川阡陌相连，生活习俗相近。在该书中，作者却借用他人的研究成果，从“自行肥效”之有无，“经典黄土”与“再生黄土”的差别，对两者做出不同的界说，并且由此引发出对这两片地域的人文环境的不同阐释，就非常富有启示性。

注重文化研究和交叉学科的穿透力，使得本书富有了丰厚的理论底蕴。同时，作者又确认，不能以文化研究取代文学批评，信守住文学研究的底线，理论的追求，也包括了文学理论的采用。作者对于叙事学、语言学、结构主义等理论的应用得心应手，举重若轻，显示出文学评论家的学养本色，而不是将作家作品视为文化研究的实验材料。在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理论两者间走钢丝，这是至险至难的，但作者不动声色地走过来了，走得潇洒，走得从容。

本书运用自己建构的“地缘文化诗学”，对新时期地域性作家群落的实证考察，高屋建瓴，气势凌厉，取得了先声夺人的效果；在进入作家研究的具体阐释之后，更表现出成竹在胸、游刃有余的非凡气度。这不能不叹服作者的文本解读的透彻和理论应用的恰切，两者之间又能精当调谐。本书论及的诸多作家，都是新时期的代表性作家，相关的研究成果可谓多矣。要想出新，谈何容易。但是，无论是论及邓友梅，还是王安忆，是刘绍棠，还是贾平凹，作者都有新见新知，夺人眼目。邓友梅的京都系列小说，大都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问世之际，就得到许多好评，研究的“可能性”似乎已经穷尽。但是，具有发现美的眼光者，仍然大有作为。在《邓友梅的京味小说》一章中，作者对邓友梅的京味小说做独到的面面观：“衍生文本”是从叙事学切入，落实在作品所描绘的京城具有标志性的文化景观和满汉杂处、雅俗混杂的日常生活风情上。“U形探寻结构”中存在着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突转”与“发现”，属于故事脉络走向和情节设置技巧，却也给我们了解艺术的奥秘打开了路径；而且，作者还对“突转”与“发现”不依不饶，刻意要从中发掘出邓友梅的创作特征，揭示出“突转”与“暗渡”的照应和互补：“突转本是一种大幅度的跳跃，是情节链条上的断裂，邓友梅却用暗渡创造出跳跃中的吻接，断裂中的桥梁，使突转突然而不突兀，精警而不生涩。他的暗渡或是动静相生式，或是双线相交式，或是生活细节隐埋式，灵活多样，不拘一格。给人的印象是，他用散淡优雅的笔调描绘笔下的世事风云，不卑不亢，从容不迫，舒徐自如。透露出京都文人典丽优雅的贵族气息。”论及邓友梅的京味小说语言，不仅对其北京方言应用做了深度阐释，还进一步地勾摄出作家语言中“化俗为雅”的句式营构，在口语化中融入古典辞赋的铺排和骈偶，这和前面所讲的U型探寻结构中的“突转”与“暗渡”所造成的典丽优雅相呼应，都是对邓氏小说暗寓的贵族气度的见微知著，妙论迭出。当然，京都文化不仅有市井风情和生活艺术，而且有“文化政治”。作者指出，在邓友梅笔下，贵胄破落子弟那五的悲剧喜剧、陶然亭练习健身的“闲人”们的柔与刚、鼻烟壶制作的兴衰、文物鉴定名家“画儿韩”的荣辱，看似驳杂纷呈，其中都隐含了意识形态的意味，它来自京都文化的庙堂意识和政治文化精神。循此生发开去，惟其有庙堂意识，有历史沧桑，才是落难归来的邓友梅心灵深处的关注；惟其有庙堂意识，在行文布局上，才会在不经意间，得到结构和语言的应和，形成其典丽优雅吧。

再比如，同样是曾经孤独，在作者的精心辨析中，也会有不同的精神指向。贾平凹的孤独，源自人生的磨难，经过庄禅精神的熏染，使其从中发现了静虚之意，残缺之美，而复归于原初浑朴。王安忆的孤独，来自父系家族和母系家族的历史漂泊，也来自自身的“无根”——生于南京而跟随父母移居上海，一方面父母亲的红色身份使他们成为大上海的接管者，一方面上海市民精致的日常生活又对这些入主者的第二代有莫名的诱惑，在享有政治优越感的同时，这些不会讲上海方言的孩子又渴望融入上海本土，从而形成王安忆作品中时隐时现的认同焦虑。本书在解析“洋场文化”时，犀利地指出，在《长恨歌》中，由“兰心”、“好莱坞”、“老克腊”等折射出来的“洋场心态”，追忆或者想象“过去的好时光”，不仅是王安忆作品中的当代人物的陈旧梦想，可能也潜藏着作家自己的心灵焦虑吧。在这里，“洋场文化”是个中性词，兼有正负两面。对“洋场文化”的分析，也许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之一，既有确凿史料，又有理论高度，既能出人意料地揭示出“洋场文化”的迷人和优越之处，也能在一片大上海怀旧的浪潮中直陈其弊端，锋芒犀利，警人警世。

《中国地缘文化诗学》从学风上来说，崔志远也为我们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参照。崔志远锲而不舍，念兹在兹，积多年的思考、追求、开掘、深化，而卓有所成，如其自述，本书“是笔者二十年来关于地域文学研究成果的集结，从专著《乡土文学与地缘文化》到《燕赵风骨的交响变奏》，再到今天的《中国地缘文化诗学》，由乡土小说门类的研究到一个省区各种文学门类的研究，再到中国文学地域性的整体性思考，正是我二十年来的心路历程。这种历程保证了研究的稳定扎实和切实可行。”这种精神，不也发人深省吗？郑板桥诗云，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我们是否还有郑板桥的这种执著和痴迷呢？

一部经典与一个时代

□王雪瑛

中华美学犹如中华文明历程中水静流深的大河，丰沛的清流，生动的气韵滋养和影响着无数艺术家的心灵，对中国当代文学和艺术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是一部蕴含中华美学神韵的经典之作。

《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全景式地展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恢弘长卷，共三部。小说以中国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的10年间为背景，展现了黄土高原上农民生活与心灵的真实画卷。小说通过中国农村从凋敝贫乏的冬天，走向万物生长的春天的历史演变，从社会的转折与生活的复杂纠葛中，从人物的选择与内心的矛盾冲突中，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人物群像，从农民写到了干部，从乡村写到了城市，从双水村写到了石圪节公社，从东拉河写到了中国农村，从黄土地上农民真实生活中面临的困惑与希冀，挫折与追求、创新与坚守、爱情与亲情、痛苦与欢乐中，描绘出了中国普通劳动者的人生追求与生命轨迹，日常生活与社会变革中的矛盾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

路遥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全景式地刻画黄土地上农民在时代嬗变中的内心世界与命运沉浮，从农民的生存境遇中关注中国的现实，思考中国的问题，真正做到了为中国大地上大多数读者写作，这是路遥作为一个中国作家的自觉意识，是他坚守的文学理想，也是中华美学对他的文学观念和人生理念的影响和塑造。

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展开了两个层面的历史，既有社会发展变迁的宏大历史，也有个人命运转折变化的个人历史。路遥将黄土高原上农民个人命运的转折放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展开，关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普通人的命运与内心世界的波澜，小说成功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同时也让读者看到了时代嬗变的过程，这样的小说既有深度，也有厚度，既视域开阔，也绵密厚重。

小说的情节主要围绕着双水村几个农民家庭，两代人在10年间的人生起伏和命运变化而展开。孙玉厚是一位坚韧忠厚，朴实勤劳的父亲形象，田福堂是一位理性上审时度势而个性上又执拗固执的父亲形象。在孙玉厚的身上有《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影子，而田福堂的身上有“蛤蟆滩第一能人”郭振山的影子。他们是小说中塑造的第一代农民的形象，如果说孙玉厚身上更多地积淀了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与审美倾向对他的影响，那么作为村支书的田福堂身上更明显地流露出1949年以后的当代文化和意识形态对他的塑造，他们的不同个性构成对比，丰富了那一代农民的形象。如果说他们那一代农民的人生中承载着这个时代的过去和现在，那么小说的主人公，孙玉厚的两个儿子，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的人生中，不但承载着时代的现在，同时正在展开这个时代的未来。

他们都是黄土地的儿子，他们的青春遭遇了时代的裂变，他们对各自的人生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少安更多地代表传统农民对乡土的坚守，他想在改造黄土地的同时，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孙少平是心怀另一个世界的梦想者，他的梦想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去寻找更广阔的世界。这两兄弟不同的人生选择寄予着路遥对黄土高原上青年一代的认识与思考，也是他对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追问：对于黄土地的坚守与放弃；家族责任与个人发展；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设计这两个人物不同的选择，显示了路遥开阔的胸襟和开放的思路，

虽然少安和少平的个性不同，选择不同，但他们的生命中同样蕴含着中华美学的精神光亮：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他们都不是命运的宠儿，他们出生在黄土高原，贫困是他们人生中不得不面对的障碍，他们的人生就是陷于现实生活的各种困境，不断磨砺、不断奋斗、不断成长的过程。路遥直抒胸臆，“人生充满了苦难，在与其不断的搏击中，人才会活得充实一些，才能获得幸福感”。

他们是黄土地上的农民，他们是大时代里的小人物，他们穷且愈坚，不坠青云之志。在路遥看来，只有劳动才可能使人在生活中强大，才能获得自我的尊严。他给孙少平写下了这样的内心独白：“一个人精神是否充实，或者说活得有无意义，主要取决于他对劳动的态度。这不是说我愿意牛马般受苦。我也感到井下的劳动太沉重了。但要摆脱这种沉重是不可能的。再说，千百万人都这样沉重。你一旦成为这个沉重世界的一员，你的心绪就不可能只关注你自身。”

理想和信念永远高悬于他们心灵的天空，中华传统美德和审美精神照耀着他们的人生旅程。失败、苦难、贫困、追求、突围、坚持，是他们生命力的证明。自强不息，是他们面对自我的准则，让他们体会到生命在挑战自我，发展自我中的力量，而厚德载物，是他们处世的原则，让他们更深切地体会到爱与付出让生命充满了温暖与和谐。

亲情和爱情是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不断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动因，是小说中人物内心矛盾冲突的主要线索，也是他探究人性深度的重要层面，更重要的是，小说在对亲情和爱情的描写中，特别在对爱情的细腻抒写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中，最生动地体现着路遥式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现实主义的深邃目光和理想主义的诗意光芒的鲜活对接。

看了《平凡的世界》后，也有人认为路遥不懂女性，其实路遥在女性的身上寄予了最纯美的爱，最诗意的理想，最动人的温暖，最传统的审美。田晓霞、田润叶、秀莲，她们像田里的禾苗一样清新朴实，又像天边的云霞一样瑰丽动人。中国传统美学强调美与善统一，而路遥正是以中国传统美学的风范来塑造女性形象的。田晓霞、田润叶、秀莲这三个女性形象体现了美与善的统一。

1986年的春天，在洛川采访的路遥的弟弟接到了《延安日报》转来的电话，说是路遥让他速回榆林，等他赶了300公里的路程到了榆林，见到路遥时，路遥哭着对他说，“田晓霞死了……”这个真实的细节充分说明了路遥笔下的田晓霞对于他来说是多么重要，那是他心中的女神。

其实在路遥的笔下，整个双水村人物关系始终处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双水村崇尚父慈子孝、尊长有序、和睦友善、先义后利、通情达理的伦理秩序。当润叶和润生的爱情遭遇父亲的强烈反对时，父女、父子之间也有冲突，但是始终没有出现敌对与决裂，相互理解让矛盾缓解之后，父女和父子之间依然充满着血浓于水的亲情，双水村虽然也有过阶级斗争的风风雨雨，但父老乡亲的内心始终积淀着传统美德和中华美学的底蕴，经历生活种种波折和考验后的人伦亲情依然如黄土高原般稳定而厚重。

当时代的春风还没有吹过黄土高原的严寒和贫困的时候，当时代的裂变给他们带来新的希望和新的困惑的时候，黄土高原的农民们始终守望着呈现出中华文化人性美和人情美的精神家园。他们的生命深深地植根于黄土高原，他们的心灵深深地眷恋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华美学精神的沃土。

《平凡的世界》意蕴的丰富与深厚，《平凡的世界》与时代风云的紧密联系，《平凡的世界》持久旺盛的生命力，让我们选择了一个最贴切的词来概括：经典。一个时代与一部经典之间的丰富内涵，足以引发我们重新深入思考，现实主义、为大多数人写作、中华美学与作品的生命力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路遥将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了对黄土高原和农民的深情抒写中，他从容而坚定地选择继承和深化柳青以来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他以深邃理性的目光注视着时代的裂变，黄土高原上农民的生活与命运，他以理想主义的诗意呈现着农民的理智与情感，从宏阔的时代主题到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从人物的精神内核到人物的情感方式，《平凡的世界》深深地浸润着中华审美精神的滋养，小说中透出的中华美学之光如绚丽的暖阳，照彻现代人的心灵。

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不仅仅是《平凡的世界》中少安和少平的人生准则，更成为现实生活中不放弃梦想的普通人坚定的人生准则，少安和少平在底层的平凡生活中，不息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追求不平凡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底层与奋斗，理想与现实，劳动与诗意，苦难与超越，他们的情感与理智，他们的意志与力量，他们的人生轨迹给当代人提供了精神能量和心灵滋养，也使《平凡的世界》历尽30年的风云变幻，依然熠熠生辉，照亮人们探寻人生、不断前行的路。